

中国历代

夏冰 主编

李斯《谏逐客书》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桓谭《上书言时政》

诸葛亮《出师表》

李密《陈情表》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欧阳修《朋党论》

方孝儒《深虑论》

李鸿章《议海防折》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名臣名谏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臣名谏

夏

冰

主编

夏冰
吴志新

刘
王建中

注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怀超 杜宇民

装帧设计:安 人

中国历代名臣名谏

夏 冰 主编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出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30 千字

版次: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418-4/K·421

定 价:11.50

印数:00001—08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导 言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秦汉统一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思想体系，以文官系统与皇帝制度相辅的帝国体制构成的政治体系，以小农耕作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体系和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的既有阶级又有社会、家族与社区相叠的社会组织这四大体系构成的一个紧密而稳定的多结构复合体。其中经济与政治两大体系中，由于统治者掌握了资源与权力，往往贪恋其位，长期盘踞于上，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而长期掌权的统治者，无论当年如何圣文神武，到身心俱衰的晚年，终难免慵懒昏聩，甚至独断专横。于是政治与经济两大体系的工作效率，往往与掌权者在位长短呈现出反比例的变化。如果对长期把持权力的个人或集团失去权力约束，这种负效应便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然而，以皇权至上为基本特征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恰恰维护了个人独裁和专断。这就使得君主在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其他军国大务时表现出极大的偶然性，特别是当一朝君主昏庸无能、年老多病或年幼登基时，这种偶然性中的危害因素就明显增加，因此常常造成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乃至导致王朝的覆灭与更迭。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秦二世、汉哀帝、晋武帝、唐明皇、宋高宗、明熹宗、清宣宗等，就是典型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历史现象，也是一个为人们所认识到的历史事实。因此，严峻的事实摆到了历代君主帝王的面前，迫使统治者从巩固和维护自身的统治着想，不得不寻求一

种有效的补救方式，以减少由于个人独裁所带来的危害。于是，在古代中国很早就产生了谏议制度的萌芽。根据流传到后代的传说，谏议制的形成似乎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尧舜时代。《管子·桓公问》里记载：“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敖于朝，而备讯矣……”另外，汉代刘安《淮南子·主术训》里也有“尧立诽谤之木，舜设教谏之鼓”的说法。

虽然尧舜时代似乎产生了原始的谏议形式，但是，真正的形成时期当在夏商周三代，而有文字可考的则是西周。《周礼·地官·保氏》载：“保氏掌谏王恶。”周公在《尚书·酒诰》中也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其命，我其可不监？”到了东周（史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王朝更迭，诸子蜂鸣，兵家纵横，由此产生了许许多多关于谏议的理论和故事。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不听从谋臣蹇叔的规劝，出兵郑国，结果为晋国所败。事后，秦穆公悔过道：“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尚书·秦誓》）具有明显的倡纳谏的意味。

流传至今的许多古籍，诸如《春秋》、《战国策》、《左传》、《列子》、《管子》、《荀子》、《孟子》等，都有一些关于谏议的记载，而像《触藿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齐桓晋文之事》、《史鱼部谏》等更是谏议的千古佳话。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收集了自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余年的诗歌305篇，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讽谏诗，并且首次提出了“谏”这个概念：“王欲玉女，是用大谏。”（《诗经·民劳》）讽谏诗的作用在于，“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采诗观志”成为西周的一种制度，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诗歌是劳动人民反映心声的一种形式，正像孔子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论语》）

谏议理论的成熟，并成为统治者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来补充统治需要的制度，使谏议达至全盛发展时期的是秦朝到宋朝。

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朝廷正式设置了谏议官职，并设谏官若干，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规谏朝政的得失。如西汉设置的谏大夫，东汉后改称的谏议大夫，到了宋代，又从门下省里分离出了主管规谏的官署——谏院，专门负责王朝大政得失的评价，并对百官的任用、各部门的措施负有责任。

其次，由于谏官设置的制度化，因此，对于帝王的举措，朝政的得失，谏官的议论和谏阻就具有了合法化的保护，也可以说有了“法律”依据。这就使得谏官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地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表意见，批评时政，甚至要求帝王或朝廷收回成命，另行谋议。这样，一方面由于谏官的存在，保证了各项军国要务、施政纲领在实施前能得到咨询和质疑，尽可能避免由此而产生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帝王虽以“天子”自居，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在有所作为时，不得不认识到谏官的存在，从而进行周详而尽量合理的考虑。

从秦到宋这一历史时期，谏议最为发达的两个朝代是汉代和唐代。

汉代作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疆域广阔。这一时期的谏议非常丰富，奏疏也极为活跃和广泛，出现了一大批敢于面折廷诤的正直大臣。他们承启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和儒家仁爱精神，勇敢地发表意见，议论时政，甚至对帝王的作为也“直言”提出批评。如张良谏沛公刘邦“安其乐”；刘向谏汉成帝刘骜营造陵墓过于奢侈；司马相如上书汉武帝劝阻其打猎。《汉书》里记载了王式因居要职显位而无谏疏险些被处刑的故事：“式为昌邑五师，昭帝崩，昌邑王嗣产，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按

理说王式也当死，因为面对昌邑王的淫乱行为，王式“亡谏书”。最后，王式以“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而得到活命。（见《汉书·王式传》）

唐王朝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表现在谏议方面也是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为谏议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贞观政要》中的《求谏》与《纳谏》两章成为唐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最为健康的标志。唐太宗李世民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才能使历代帝王黯然失色，其中最为重要的特色就是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沟通。他“恐人不言，导之使言”（《贞观政要》），主张积极纳谏，使之成为王朝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开明的政治局面。上至宰相、大臣等朝廷命官，小到县衙小吏，都有敢于直言进谏者，对进谏有功者给予褒奖。如：绘出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图像，挂在凌烟阁。加封魏征二品光禄大夫，封郑国公等。唐太宗与主要谋臣魏征、王珪、褚遂良等人的关系，成为千古君臣的楷模。

晚唐时还出现了另一个著名的谏臣，他就是陆贽。史载“贽性忠荃”、“政或有缺，巨细必陈”、“事有不可，常力争之”。他成为一代名臣，被宋代苏轼等人奉为人臣的典范。苏轼等人在给宋哲宗的《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中，赞许他的谏议“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汉乱之龟鉴”。无奈唐清宗昏庸，不能用贽言，不然的话，唐清宗一定会成为中兴之主，“贞观可得而复”。

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专制较为严重的朝代。经过1000多年的社会演化，封建社会已经到了后期，整个社会机体渐趋僵化，原始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封建专制统治与日益活跃的市民生活和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形成了强烈反差。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也由于其本身虚弱本质所致，封建统治者更加不能容忍反对意见，甚至不同意见也不准提出。“御史纠弹，皆承宗旨”（《明史·解缙传》）及明清形成大量而残忍的文字狱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作为制度化的谏议，虽然也在不断产生，其中不乏面折廷诤的铮铮铁骨，但是很明显，它的作用已十分微弱。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求直言，叶伯巨进谏，极不客气地指出明朝初年的三个失误：分封太侈、用刑太滥、求治太速，因而触怒了朱元璋。他大怒声称要亲手将叶射杀。后来，叶未遭朱元璋的“手刃”，但也下狱，死在狱中。另一位明朝皇帝嘉靖朱厚熜，在位45年，前后只上了四次朝，由此大权旁落，产生了大奸臣严嵩。权奸当道，忠良扼腕，社会政治腐败黑暗。此时的嘉靖皇帝却在深官中设斋建醮，潜心修炼，以求长生不老之术。嘉靖十九年（1541），太仆寺卿杨最规谏，廷杖致死。第二年，御史杨爵上疏，下锦衣卫狱。嘉靖四十五年（1566），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上疏进谏，也被下了锦衣卫狱，幸亏嘉靖死得及时，海瑞才幸免于难。

清代，特别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国门被迫打开之后，大一统的泱泱帝国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下，社会在急剧变化，一方面是国势的日益衰弱，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则是西风东渐，新事物层出不穷。面对西方列强，以西太后为代表的皇权政治更加刚愎自用、骄横跋扈，这是一种垂死的挣扎，困兽犹斗的绝望表现，从此，谏议的作用就更加微弱。这一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也更加明显，上层的意见往往失之于偏颇、落后、保守和僵化，大量来自社会下层的呼声由于专制和严格的等级制度无法上奏，致使谏议制度基本上处于僵滞和死亡阶段，多是徒具形式而已。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康有为的几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上书均被拒绝接受，就连著名的“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二书》）也被督察院找了个借口而拒绝。清末最后一次著名的上书——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富国强兵的要求，但遭受到冷遇，中国的谏议制度可以说就此打上了一个句号。它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瓦解而瓦解了。虽然它的作用对后世还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历史现象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产生、发展、消亡的使命。

中国的谏议理论没有完整的体系，也从来没有人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但是，另一方面，关于谏议的论点却非常多，零星地散见于各代的经、史、子、集和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言论之中。刘泽华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中，就先秦谏议理论进行了综合归纳，提出了七种观点。（一）扬“和”弃“同”论；（二）为社稷论；（三）为道论；（四）疏导论；（五）补短论；（六）尊师听教说；（七）拒谏易位说。

这七种理论观点的依据是充足的，不仅是对先秦时期谏议理论的概括，同样也适用于整个谏议制度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认为还有一项重要的理论，这就是源于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家天下”的概念。

在我国古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君主帝王与国家百姓的关系往往被一些儒家描述成一种家庭关系。荀子就曾在《荀子·王制》中说过：“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下，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虽然这种观点在先秦时期被一些具有民本思想的学者和思想家所驳斥，可是，越到后来，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越加严重，君主帝王与国家百姓统一体的概念就越加明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民谚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树倒猢猻散”，直至把县太爷叫做“父母官”等等。国的概念就是家的概念范围的扩大，因此，同在一个“大家”之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子产与子皮的一段对话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子产说：“子（指子皮，名罕虎，郑国上卿，前任执政大臣）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屋椽）崩，侨（郑国大夫子产，名侨）将压（压）焉，敢不尽言。”（《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这里子产明确把子皮比喻为栋梁，栋梁折断，房屋倒塌，当然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利害所在，不容缄默。虽然这种理论似乎降低了谏议者，特别是那

些置生死于度外的谏议者的道德水平，低估了他们的精神境界，但是不可否认，缺少了这一观点的谏议理论只能是不完备的理论。

谏的方式和种类因谏者的态度和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自古以来，就有五谏的说法。《后汉书·李云传》：“论曰：礼有五谏，讽为上”。注引《大戴礼》：“五谏谓讽谏、顺谏、谏、指谏、陷谏也”。其他如刘向《说苑·正谏》、班固《白虎通·谏诤》及《公羊传》、《唐书·职官志》里都有五谏的说法，只是名称上略有不同。

就谏者的态度来说，谏的种类有以下三种：

一、直谏。即是直言极谏。基本态度就是出于忠君为国，或者民族、道义上的目的，大义凛然，置自己的个人生死于度外，这些人千百年来一直是道德上的典范，被史家称为“直言切谏之臣”。我国历史上这样的“死节”之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

直言极谏者的命运一般都掌握在君主和帝王手中，如果君主或帝王个性残暴、昏庸多疑和专制独裁，直言进谏者的结局基本上都是悲惨的。例如：夏桀时的关龙逢，商纣王时的比干、梅伯，东汉桓帝时的李云、杜众，明朝的杨涟、左光斗、黄尊素等等，都是因为直谏冒犯了帝王而惨遭屠戮的。如果君主或帝王比较开明，心胸博大又想有所作为，直谏不仅不会惹来杀身之祸，反而会因此而获得美名、奖赏、提拔和重用。唐代魏征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二、顺谏。《韩非子·说难》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人主的逆鳞，就是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严，向帝王的权力和尊严挑战，往往是自寻坟墓。因此，韩愈接着说：“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因此，身居谏议之职的谏官们或者大臣在进谏时，大多是小心翼翼，谨慎从事的。具体地说，进谏时必须考虑时间、场合和对象的情绪，及其谏言的用语程度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察颜观色，揣摩对方的心

理，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最佳处就是在不冒犯帝王权威的前提下，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若夫托物见情，因文载旨，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贵在于意达言从，理归乎正”（《后汉书·李云传》）。这些谏文的一个显著称点，开篇点是极力贬低自己，盛赞帝王的英明伟大，堆积了一大堆帝王非常中听的“奉承”话，诸如：“圣明”、“睿智”、“千古未遇”、“太平盛世”等等。《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很有代表性：“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如此称颂一番之后，才把自己进谏的真正意图亮出来。另外像《触讦说赵太后》、《陈子昂谏用刑书》等都是比较有名的。

三、死谏。顾名思义，就是用死来谏阻帝王。可视之为直谏的极端形式。这种情形较为少见，常常在政治或民族发生危机而帝王大权旁落或闭目塞听之时，谏者希图以死谏来震聩发聩，触动帝王“圣心大开、神旺昭彰”，从而挽狂澜于既倒。这方面的例子，比较有名的是《论语·卫灵公》里记载的史鱼“尸谏”一事。史鱼为春秋时的卫国大夫，相传他在临死之前，因担心卫灵公重用小人弥子瑕，而退贤者伯玉，嘱停尸北堂以正君，卫灵公终于醒悟。

就谏者采用的方式来说，也有以下三种：

一、文谏。就是采用写文章的形式进谏。文章形式多样，多呈奏帝王。诸如：奏章、策问、疏、书、折、札等。这些谏文一般来说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而准备充足、目标明确、观点能够得到最充分的阐述，都是较为精彩的政论文，其政治、史学、文学、艺术等价值都很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份宝贵遗产。

二、兵谏。就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属下战将用武力迫使帝王或统治者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历史上最有名的兵谏是发生

在公元750年的唐朝的“马嵬坡兵变”和现代史上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这种武将的规谏与文臣进谏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留给帝王或统治者的只有一条路：听话和服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左传·庄公十九年》)。这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口谏。这种规谏方式是即时性的，随意性较大，往往因某件眼前发生的事情而产生。按理说，这种方式的规谏，后代是无法知道的，好在史官给予了及时的记录，使我们得以了解到当时事件发生的情况。这种谏的故事在先秦著作中，特别是《战国策》、《国语》、《左传》，散见很多，一般是通过对话表现出来的。例如《蹇叔哭师》、《邹忌讽齐王纳谏》、《淳于髡谏齐勿伐魏》、《官之奇谏假道》、《召公谏厉王止谤》等。

谏议对后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在政治上，虽然谏议基本上表现为个人的行为，并且在制度和人生安全上并没有提供足够而有效的保障。就进谏者来说，往往无疑于与虎谋皮，冒有很大的风险，甚至危及到整个家族的利益，但是每朝每代，面对君主和帝王的胡作非为，都有敢于站出来“说话”的谏议者。商朝末年，纣王暴虐，大臣箕子、微子、比干，一再进行谏阻，三个人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比干甚至被剖了心。明朝大臣海瑞，直言极谏，置生死于度外，临上谏前，预备了棺木，诀别亲子，遣散家仆，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浩然正气，直冲斗牛，这种政治上的鲜明态度和正义感一直激励着后人。

谏议者在道德上表现出的完美人格和崇高精神，成为官吏的典范，代代相袭，形成了我国官吏制度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个人和国家、民族利益发生重大冲突时，虽然谏议者的用心与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一朝一代的王权，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他们维护的仍然是国家民族的利益。

作为文谏之臣，历代谏议者所作的上疏、奏折、驳议、表策、

章札等都是谏议者精心撰写的政论精品，它们构思精密，条理清楚，逻辑性很强，并且语言精炼，注意用典和修饰，富有文学色彩，说服力和感染力强。而历代谏文所共有的最大特色是通篇熔铸了谏议者的碧血丹心，所谓的寓情于理，动情明理。这情与理的结合，集中表达了谏议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凛然正气与赤胆忠心，表现出谏议者的浩然正气和深明大义。正是谏议者的字字忠君、句句爱国之情，才具有了感动上苍，震撼人主的回天之力。

历代谏议还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我们知道，历代史学家不乏南史、董狐一样的“良史”。修史也不乏“春秋笔法”，但是总的来说，每朝每代的史书修撰都是为当朝统治者服务的，带有浓厚的帝王正统思想，因此，所谓“正史”，往往把中国历史许多真实面貌掩盖和歪曲了。然而，谏文这类宝贵的历史文献，由于谏者抛却了功名利禄，置生死于度外，因此，没有人为了伪饰，对历史作基本真实的描述，而且多是对“问题”作描述。正像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所说：“历朝的奏议，它相当于现代报纸上的社论，在当时是大臣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报告？可见所提的事出了毛病，否则就没有建议了。”（《论语别裁》）近人林则徐在《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的奏折中，对当时英国鸦片对中国的侵害程度描述道：“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是非常真实的。这些谏文往往体现了历史的良心。

以上仅就谏的政治的、道德的、文学的、史学的诸方面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了简扼介绍。实际上，无论是谏文，还是谏者其人，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多层面的，包括文化的，官吏制度的，民族性格的等。进谏者们以其无畏的胆识和坚硬的骨气，成为“中国的脊梁”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连同他们的谏文，千百年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作为“史鉴”，必将对我们的今天和明天继续产生影响。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号令不从”。（《论语·子路》）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射者正己而后发。”（《孟子·公孙丑上》）

让我们记取古代圣贤们的这些格言，从自己做起。

夏 冰

目 录

导 言	(1)
-----------	-----

李斯 《谏逐客书》	(1)
-----------------	-----

张良 《谏沛公安其乐》	(7)
-------------------	-----

晁错 《论贵粟疏》	(9)
-----------------	-----

贾谊 《论积贮疏》	(16)
-----------------	------

枚乘 《上书谏吴王》	(20)
------------------	------

司马相如 《上书谏猎》	(24)
-------------------	------

刘向 《谏成帝营陵泰奢》	(27)
--------------------	------

桓谭 《上书言时政》(节选)	(36)
----------------------	------

左雄 《谏顺帝封赏宋娥》	(40)
--------------------	------

卢植 《上书言为政八事》	(43)
--------------------	------

荀彧 《上书曹操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46)
--------------------------	------

诸葛亮 前《出师表》	(49)
------------------	------

曹植 《求自试表》	(54)
-----------------	------

李密 《陈情表》	(63)
----------------	------

傅咸 《谏武帝并官省事》	(68)
--------------------	------

孔琳之 《谏止谷帛之法、厚葬之俗》	(71)
-------------------------	------

孔觐	《上书言货币》	(74)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77)
陈子昂	《谏用刑书》	(82)
陆贽	《谏德宗选才太精》	(92)
韩愈	《谏宪宗迎佛骨》	(99)
欧阳修	《朋党论》	(107)
王安石	《上仁宗言事书》	(113)
苏轼等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150)
岳飞	《谏高宗苟且偷安》	(154)
方孝儒	《深虑论》(其一)	(157)
李文祥	《谏孝宗择谨原者供使令》	(161)
杨爵	《上书言时弊》(节选)	(163)
海瑞	《谏世宗设斋建醮》	(167)
黄尊素	《谏熹宗早断除忠贤》	(175)
钱秉铨	《拟上行在书》	(178)
林则徐	《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191)
曾国藩等	《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节选)	(198)
李鸿章	《筹议海防折》(节选)	(205)
郭嵩焘	《条议海防事宜》	(237)
康有为	《上清帝第二书》(节选)	(257)
后 记		(322)

李斯 《谏逐客书》

【背景】

始皇十年（前 237 年），韩国水工在秦国做间谍，被秦人发现。秦宗室贵族纷纷向秦王嬴政进言，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是楚国人，当时拜为秦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他上书阻谏，历叙“客”之有功于秦，力陈逐客之失。其建议为秦王采纳，遂除逐客之令。

【作者】

李斯（？—前 208 年），战国楚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人。李斯为荀子的弟子，他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官至丞相。秦始皇死后，与赵高合谋杀太子扶苏。秦二世即位后，为赵高诬陷谋反，被腰斩于咸阳。

【原文】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①求士，西取由余于戎^②，东得百里奚于宛^③，迎蹇叔于宋^④，来丕豹，公孙支于晋^⑤。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⑥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⑦，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⑧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⑨，拔三川之地^⑩，西并